

目录

目
录

绪 论	001
上 编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	
第一章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011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011
二、分期的“概念”、“标准”与“界标”	018
第二章 近代史的分期方法	037
一、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	037
二、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046
三、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 为标准的分期法	050
四、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055
第三章 近代史上限与下限的讨论	063
一、关于上限的三种意见	063
(一)视 16 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为中国近	
	001

代史的开端/063	
(二)视 183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070	
(三)视 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073	
二、关于下限的两种意见	079
第四章 分期引起的其他论辩	086
一、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086
(一)分期的标准与标志/087	
(二)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092	
(三)几种具体的分期法/103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10
(一)甲午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完全形成/110	
(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问题的商榷/116	
第五章 近代史分期论辩评述	126
一、共同的理论方法与着眼点的差异	126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学术局限	137
中 编 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第六章 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再度兴起	157
一、再度讨论的历史时代	157
二、基本线索讨论概况	161
(一)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161	

(二)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169	
(三)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178	
第七章 关于基本线索的论辩	188
一、“三次革命高潮”说	188
二、“四个阶梯”说	194
三、“民族运动”说	207
四、“两个过程”说	210
五、“双线”说与“三个阶梯”说	222
六、“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	226
七、“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	228
八、“新三次革命高潮”说	230
九、“两段论”说	233
第八章 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深入探讨	244
一、关于上限的讨论	244
二、关于下限的讨论	259
三、近代史的划段问题	270
第九章 近代专史线索与分期的讨论	274
一、中国革命史的分期	275
(一)中国革命史的上下限问题/275	
(二)中国革命史的不同分期/282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284	
二、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291

三、其他专史的线索与分期	296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296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分期问题/299	

第十章 基本线索论辩的评价	304
一、与五六十年代近代史分期论辩的比较	304
二、进一步探讨基本线索问题	310

下 编 革命与改良的论辩

第十一章 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319
一、革命与改良的概念	319
二、革命与改良论战与史学重大是非问题	330

第十二章 “告别革命”及其批判	342
一、《告别革命》一书的论点	342
二、对“告别革命”的批判	347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357
-----------------	------------

编辑后记	388
-------------	------------

绪 论

一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它的探索不但有助于学科体系的建设和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的开展,而且有益于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其本质的把握。因此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两次对此问题的探讨和论辩,这种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发展。本书的前两编就是对这两次探索和论辩基本情况的阐述,其主旨在于捋清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历程,并为将来进一步探索这个理论问题提供一个学术背景。

上编主要叙述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辩。

1954 年胡绳最早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是胡绳对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检讨。这个检讨同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开始重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及苏联历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影响关系十分密切。胡绳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来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并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从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辩。当时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也同意以阶级斗争为标准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但是在具体分期上个人又有各自的意

见,彼此之间展开了论辩。还有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守任和范文澜。也有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代表人物是金冲及。此外,还有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刘大年。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问题,也有不同的争论。关于“上限”有三种意见:其一,尚钺把 16 世纪中叶或稍后的明清之际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二,来新夏把 1939 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三,大多数学者把 1840 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下限”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下限;一种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1956 年以前,未涉及对下限的讨论,人们按照传统的习惯,以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近代史终结的标志,近代史的下限似乎已成定论。1956 年林敦奎首先提出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长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撰文系统阐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下限的是李新与陈旭麓。

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下,还引起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标准和标志问题、近代与现代经济史的分界问题的讨论,并形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几种具体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学者虽然争论较为激烈,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方法,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指导,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对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他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时,虽然着眼点不同,进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从当时的论辩过程中可以看出,参加论辩的学者,不管是自己的立论还是对他人的驳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得出来的,所以从不怀疑自己的结论。这是当时学者们共同理论方法

的充分体现。为什么运用共同的理论方法会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这是由于经典理论的论述有所侧重，学者对经典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掺和了各自不同的主观意识，进而导致着眼点的差异。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事实上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是它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教材编写的实践上也有了新的进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是巨大的。当然，仅仅靠几年的讨论，要想解决更多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这次论辩的学术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包括运用理论和思维方法的局限等等。

二

中编主要叙述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到了70年代末又再度兴起，并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展开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这次讨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取得重要成就的反映。这个时期仅以“基本线索”和“近代分期”命名而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百余篇，而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竟达到了二百多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参与这一主题探索的史学工作者也有上百人。这使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成为二十年来近代史学界讨论的几个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各种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还形成了“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和“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等。通过这次讨论，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和基本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纵观二十余年的讨论，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把握和认识它。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指1978年范文澜

遗著的发表到 1985 年曾景忠发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前后的这一段时间。1978 年《社会科学战线》在第 1 期发表了范文澜的遗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一文章的发表，透露了近代史学界在渡过了“文革”之后，开始重新注重学术研究和关注近代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信息。1979 年《昆明师院学报》在第 4 期发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应该再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是 50 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讨论的继续，实质是赞同李新和陈旭麓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 1949 年的观点。而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 1980 年《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84 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本人的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在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周清泉等人先后发表文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看法，并参加了热烈地论辩，使得讨论比五六十年代更加热烈，观点也更加鲜明，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理论观点。

2、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这一阶段主要指 1986 年姜进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到 1990 年胡绳在《近代史研究》第 6 期发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学者仍然很多，其中陈旭麓、夏东元等学者的学术探讨有一定影响。

3、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这一阶段主要指 1991 年姜秉正在《学术研究》第 1 期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到 1999 年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第 5 期发表《50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前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在深入

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其中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和林华国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等文章影响较大。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发表文章阐述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重心是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分期和分期的标准问题,所以,对上下限问题讨论得不多,没有引起更大的争论。80年代以后,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进一步讨论,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中国近代史时限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争论,成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问题,国内学者虽然大多数都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划在1839年,1861年,1905年,1911年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50年代就有学者针对1919年的下限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下限问题又开展新的讨论,这种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进行的。讲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讲近代史的结束,两者实际上是在谈一个问题。那么,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始于何时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甲午战争说;1905年说;1911年说;1915年说;1917年说;1919年说;1949年说;1956年说等。在这其中,持1919年说和1949年说的学者较多。有的学者认为,持1919年说是“合乎习惯”,持1949年说是“合乎科学”,所以长期以来,这两种主张一直并存,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上也有所反映。

八九十年代,由于对中国近代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又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有关专史线索和分期问题的研究。正如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所说:“近年来史学界有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多年来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较著称的是

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的体系；这显然是一种重视资产阶级运动的看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讨论会上，则竟提出应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个讨论势必涉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看法。”（《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与“史学界至今争论未已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紧密联系着”，“中国近代哲学史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同经济、政治史紧密相关”（张琢：《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近代哲学史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23、25页）。事实正是如此，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史的线索与分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五六十年代近代史分期的论辩与八九十年代基本线索的论辩，两者比较，有如下几方面共同之处：其一，意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其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其三，探讨了重要的历史问题。两者比较，还有如下几方面的不同之处：其一，后者思考的范围和思维的空间逐步扩大；其二，后者更重视探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论；其三，后者更注重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问题。

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两次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的高潮，使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对它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完结，还将被不断地探索下去。为使新的探索取得新的成效，笔者认为还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要注重加强微观历史的研究；其二，树立“纲”与“目”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其三，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总之，经过半个世纪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的探索，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在新的世纪里，在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将继续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

三

下编主要叙述 90 年代革命与改良的论辩。

粉碎“四人帮”后,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了重新评价戊戌变法的热潮。随之史学界非常关注地探索有关改良、改良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概念,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历史。邓广铭在《光明日报》1980 年 8 月 26 日发表《论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别》一文,详细阐发了他对“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概念的理解和认识。90 年代以后,学界又一次探索革命与改良的概念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有的学者还认真梳理了经典作家对改良与革命关系的有关论述,并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肯定革命但并不拒绝改良。其次,改良而不忘革命,特别是当革命条件成熟时,就要采取坚决的行动。第三,对于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必须揭露和批判。这样的概括和归纳,使人们更清晰了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46—148 页。)

90 年代有人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告别革命”主张。一些中青年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者则在不同场合的讨论中,也从不同的角度与之不谋而合,进而拉开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论战的序幕。对辛亥革命的褒贬,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辛亥革命究竟该不该发生,人们各持己见。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诸如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和发展道路、中国近代的反帝反封建、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反传统定论的新观点。1995 年以来,一部分学者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发表的文章中,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并在学术界形成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批判“告别革命”论的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高度分析和评判了“告别革命”论的错误和危害,进而有益于人们坚定信念。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会再度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迎来新时代的繁荣和辉煌。

上 编

五六十年代中国
近代史分期的论辩

第一章 | 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时代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的主张。问题提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论辩。这场讨论一直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

胡绳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主要是想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来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胡绳为此作了缜密的思考,并在文章中专门撰写了“问题的提出”一节,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胡绳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著作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书籍由于不注重科学地分期和缺乏对基本线索的准确把握,所以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欠。他把这类书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阐明中国近代史,这类书只是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片面,而忽视了许多带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比如李泰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一书,把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更迭而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

等,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同样依照北洋军阀的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再比如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一书,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胡绳认为以上这类划分时期毫无意义,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中本质的东西。另一类是用“纪事本末体”方法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若干突出的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而放弃了具体的分期办法。比如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版)就是这样。由于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胡绳看到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所占的比重不同,其中就有跟“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有关的因素。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容易只顾及某些大的政治事件了。胡绳特别指出,有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籍,也有类似的缺点。比如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版)一书,在第五章“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战争前中日经济政治状况与两国的外交关系”一节中,述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工业开始萌芽的状况。到了第六章“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为叙述“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才又附带叙述到甲午战争前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和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的发展,很明显是密切关联的,把二者分开来阐述,缺乏完整性。再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7年版)一书,也把这二者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叙述。在标题为“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当时的工业发展的状况,到了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第七章中才又退溯到“甲午战前改良思想的酝酿”。这样的处理给人以割裂历史的感觉。与胡绳观点相似,戴逸在谈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也对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评价:“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近

代史的系统著作。这本著作打击了封建的、买办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历史观点,在近代史一片荒芜的领域中作了初步的垦辟工作。但是,正由于范文澜同志没有能在比较科学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来完成自己的著作,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本著作的科学性。使它在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上显得不够有力。”^[1]

胡绳的上述分析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有很多种,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版)、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版)等等。这些书籍在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方面都有所建树,对中国近代史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偏重于纪事本末,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讲,采用这种方法撰写,就会出现上面所谈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书籍在写作思想上有自己的特点,并力求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本质与规律。比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一书,“采混合式的编法,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之事变与运动皆冶为一炉,作综合的叙论”^[2]。李鼎声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混合式的编写法,是和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

历史学在现今已不能单纯地看作一种记载的科学了。自从新的历史观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以来,历史学就担负了一种极重大的任务: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种活动之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来,不只是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要从新历史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如果目的仅仅在要使我们依据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来

发扬所谓‘国粹’，或记忆许多兴亡治乱的事迹与民族英雄的伟业，那简直是在和历史开玩笑。实际上，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50年11月新9版，第1-2页）

了解这段话的意义，会使我们感到李鼎声的历史观，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与胡绳所阐述的那些情况有一定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就连李鼎声在具体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未必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我们在整本著作中还看不到这一点。全书似乎还是以某些政治事件为纲，却很少涉及其他。因此，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显然是重要的，而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这可视为胡绳提出分期问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胡绳当年提出分期问题，也与当时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背景有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不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亦成为中国学人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从此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自从李大钊撰写《史学要论》这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奠基作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史纲》（翦伯赞）、《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从此中国史学有了新气象。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我国社会主义革